

規訓民族資本家： 「五反」運動再考察

• 鄭維偉

「五反」運動表現出由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中的微觀機制，即加工訂貨政策導致「利潤計劃化」和「商業倫理政治化」，前者將私營工商業逐漸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後者改變了民族資本家在新秩序下的經商理念和經營策略。

新中國建國初期的「五反」運動，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政治轉折點。在此運動之後，中共中央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計劃。中共為甚麼在此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民族資本家為甚麼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本文旨在探討「五反」運動表現出的由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中的微觀機制，即加工訂貨政策導致「利潤計劃化」和「商業倫理政治化」。在筆者看來，資本利潤計劃化最終導致私營工商業逐漸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這是經濟秩序的再造；而商業倫理政治化，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民族資本家在新秩序下的經商理念和經營策略。

本文選擇上海和天津作為分析樣本，是因為這兩個城市在建國伊始就在中國經濟中具有特殊地位。據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1947年對中國主要都市製造業的統計，其中僅上海、天津兩地，工廠數即佔63%，職工人數佔61%^①。

一 資本利潤計劃化

1949年內戰甫一結束，中共為恢復和發展經濟，即對私營企業實行加工訂貨政策。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這意味着有了相對穩定的市場，極大地促進了其經營積極性；對新生政權來說，則可充分利用既有生產設施，有效醫治戰爭對國民經濟的重創。所以，該政策在經濟恢復時期，能使國家和民族資產階級達致雙贏。可是，它本身也蘊含着極大的風險。如果長期實行，有可能會導致民族資本家創新精神萎縮，形成對國家的依賴，而國家則會揹上沉重的製造市場需求的負擔。這樣，本來以刺激市場為目標的政策，最終有可能導致市場萎縮或虛化。但對於準備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變的中共來說，這項政策卻未必不是最優的選擇，因為加工訂貨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經濟形式，而從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過渡幾乎只有一步之遙^②。就此而言，面向私營企業的加工訂貨愈多，則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就愈大。

* 本文承蒙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胡其柱、復旦大學高研院博士後流動站謝亮和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蔡文軒博士的批評指正，在此謹致謝意。

茲以上海和天津兩地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情況為例來說明。如表1所示，上海和天津兩地加工訂貨佔私營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分別從1949年的10.0%和19.8%，增加到1952年的58.8%和59.9%。也就是說，在「五反」運動結束之後，國家通過加工訂貨的方式，基本上控制了私營工業的發展，調整了私人工業結構，使之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私營工業總產值也明顯增長，比如上海市私營工業總產值1949年為267,352萬元，而1951年則高達380,251萬元，增加了大約42.2%^③；天津市私營工業總產值1949年為35,284萬元，而1951年則為69,989萬元，增加了98.4%^④。

民族資產階級私人工業仰賴於國家的加工訂貨獲得巨大的發展，這就為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換言之，即使沒有「五反」運動，中共借助於加工訂貨的外在控制，實行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也是遲早的事情。對此，毛澤東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曾指出，「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⑤劉少奇在同年10月20日給斯大林的信中也寫道：「在十年以後，中國工業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百分之十，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上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他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⑥

民族資產階級私人工業仰賴於國家的加工訂貨獲得巨大的發展，為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即使沒有「五反」運動，中共借助於加工訂貨的外在控制，實行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也是遲早的事情。

表1 上海與天津私營工業中加工訂貨與自產自銷產值的比重，1949-1952年

單位：百分比

地點及 產值 比重 年份	上海			天津		
	私營工業 總產值	加工訂貨 產值	自產自銷 產值	私營工業 總產值	加工訂貨 產值	自產自銷 產值
1949	100	10.0	90.0	100	19.8	80.2
1950	100	31.0	69.0	100	37.2	62.8
1951	100	43.1	56.9	100	44.2	55.8
1952	100	58.8	41.2	100	59.9	40.1

資料來源：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141；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天津市檔案館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天津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附錄表7。

但隨着經濟恢復，私營企業與政治結構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摩擦。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新秩序一方面為他們的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另一方面也構成了限制。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鮮明地表現為民族資產階級自由發展的要求與中共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理念之間的衝突。民族資本家要求自由發展，實際上是要求政府減少市場干預，回歸「守夜人」的角色，而這一要求在中共看來無異於「向共產黨向工人階級進攻爭奪領導權」，「企圖使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居於領導地位，變我國為他們所幻想的資本主義的國家」^⑦。

此外，依照中共既定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理念，也必然要求國家掌握愈來愈多的資源，實現對市場的調控，具體途徑就是擴大國營企業的範圍，限制自由市場。因此，國家與資本家之間的衝突是結構性的、不可調和的。在國家加工訂貨佔私人工業比重愈來愈大的情況下，資本家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向

中共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對資本家利潤率的控制。控制了資本家的利潤，就控制了資本家的命脈，進而控制了私人資本之間形成的自發市場。「五反」運動的真正作用就體現在這裏。

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偷稅漏稅、騙竊經濟情報等行為，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預期的是，即使沒有「五反」運動，這場衝突也遲早會出現。

如果中共沒有提出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的要求，那麼鼓勵民族資本家掙脫加工訂貨而面向市場，無疑是其最優選擇。可是，當時中共的根本目標是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這又必然導致對資本家利潤率的控制，否則國營企業的競爭力就很成問題。換言之，控制了資本家的利潤，就控制了資本家的命脈，進而控制了私人資本之間形成的自發市場。「五反」運動的真正作用就體現在這裏。事實上，毛澤東在論述「五反」運動的目的時首先指出：「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以利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情況不明，是無法進行計劃經濟的。」^⑧

如何界定資本家的合理利潤，在實踐中很難操作。可是，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抓不住資本家的「七寸」，「五反」運動在經濟上成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1952年6月24日，陳雲勾勒了一個加工訂貨利潤的合理標準的大致輪廓：「按照不同情況，保證私營工廠按其資本計算，在正常合理經營的情況下每年獲得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二十左右，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利潤。這個利潤是按照正常合理經營的中等標準來計算的。」^⑨

在陳雲提出加工訂貨利潤的合理標準之前，天津市就已經開始劃定合理利潤了，具體辦法是：「根據該行業的一半利潤情況，參考稅務局所訂之純利潤，並參考解放前之該行業利潤情況，先經資本家討論提出數目，然後確定。特殊商業之利潤專門計算。」^⑩這一原則性的規定，基本上照顧到了歷史和現實。陳雲講話之後，天津又做出了調整，利潤分配基本上是以中等戶為標準，並有所提高。

到1952年底，天津市財政經濟委員會在對天津大中型42戶私營工廠進行調研的基礎上，提出利潤分配原則是照顧工人現有的福利，除去一般所得稅30%、公積金10%，純利潤的分配是工人福利和獎金佔14至17.5%，而資方紅利及股息佔42.5至46%；至於超額利潤，由於主要是工人勤勞所得，故在分配中應佔有較大比重，具體方案是扣除所得稅30%、公積金21%後，工人福利和獎金佔31.5%，而資方所得僅為17.5%^⑪。隨後，市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了對真實盈餘的處理意見，除先繳納所得稅外，餘額按下列比例分配：(1) 公積金佔10%；(2) 資方紅利及代理人酬勞金不能低於45%，不能高於55%；(3) 勞方所得不能低於35%，不能高於45%，其中：職工獎金佔30到35%；職工福利基金佔5到10%^⑫。據天津恆源等10個中等廠的調查，1949年資方所得佔盈餘分配總值的63.7%，1951年為15.2%，而1952年經過「五反」運動後突降到0.4%^⑬。

上海對長期、大部分或全部接受加工訂貨的企業有一個基本判斷，即它們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而不再是私人資本主義性質。即使如此，在界定合理的利潤分配時也困難重重。他們提出了四套方案：一、照私營條例辦事；二、高於銀行利息（至少不少於銀行利息）；三、工業利潤高於商業利潤；四、四馬分肥。市政府究竟選擇了哪套或哪幾套方案，史料文本沒有給出清楚的說明^⑭。不過，根據某些工廠職工福利及超額獎金的增加，或許可窺一二。

以上海華生電機廠和國營上海電機廠為例。華生廠工資、福利、獎金、膳食等佔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7.83%，國營上海廠則為6.62%；又如造紙業中，五家私營造紙廠，平均每一職工每月的收入（包括工資、生產獎金、勞保福利、年終

獎金)是145萬元，其中一個學徒一個月有110萬元，一個勤雜人員有145萬元，連揀破布的老婆婆每月也有90萬元收入。而上海工資標準較高的國營利華紙廠平均每一職工每月收入不過93萬元。由於國營廠與私營廠的每人每月平均工資是一樣的，但私營廠職工的獎金福利等較多，故實際收入要比國營廠高56%^⑥。

顯然，該利潤分配方式的基本特點，是讓工人分享更多的企業利潤。這必然損害私營企業的積極性，並致使上海私營工商企業陷入利潤降低，虧損面廣，流動資金減少的困境^⑦。如果考慮到政府的故意殺價，則資方的利潤就更低了。比如百貨公司收購梅林公司貨物，先打九八折，再打六五折，資本家叫虧折了15%^⑧。另據當時對上海市鋼鐵加工等十四個行業從1950到1952年的利潤率統計(表2)，我們也可以發現，所有行業的利潤在1952年都出現驚人的大幅下跌。

表2 上海資本主義工業主要行業歷年利潤率，1950-1952年 單位：百分比

行業	利潤率及年份		
	1950	1951	1952
鋼鐵加工	38.0	69.9	0.9
電訊電器	25.3	54.8	16.4
旋轉電機	18.3	35.9	11.1
化工原料	25.7	29.3	7.1
有色金屬	47.8	100.9	19.1
捲菸	8.9	9.6	1.8
造紙	14.9	33.7	2.5
橡膠	19.9	64.8	4.2
製藥	25.7	33.7	12.3
食品	9.5	20.4	3.5
棉紡	1.3	5.9	7.3
棉布織染	31.1	18.7	11.5
毛紡	4.7	22.0	3.4
絲綢	2.5	6.9	3.2

資料來源：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室編：《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145。

國家對加工訂貨及利潤率的控制，導致相當嚴重的後果。一旦加工訂貨利潤過低，為了保證資本利潤，資本家必然會偷工減料、以次充好。而如果訂單大多只能來自國家「恩賜」，資本家為拿到訂單，很可能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行賄拉攏。比如上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特設了專事勾引幹部的機構，叫做「外勤部」。這個機構前後腐蝕了25個國家機關的65個幹部，自稱「大康是幹部思想改造所」。再如協和新五金號老闆×××派小老婆勾引幹部，承攬軍事訂貨，以草繩爛麻外包白棕，冒充白棕繩賣給人民解放軍，使人民解放軍在解放舟山的戰役中因白棕繩崩斷而覆沒11隻船，犧牲80餘人^⑨。

隨着國內經濟逐漸復蘇，資本家通過加工訂貨獲得了利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加工訂貨的利潤低於市場利潤的話，則資本家就會把資本轉向市場；如果國家付出的利潤過高，則加工訂貨也難以維持。雙方必然圍繞利潤問題進

讓工人分享更多的企業利潤，必然損害私營企業的積極性，致使私營工商企業陷入利潤降低的困境。為了保證資本利潤，資本家必然會偷工減料、以次充好。而如果訂單大多只能來自國家「恩賜」，資本家很可能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行賄拉攏。

行新一輪的較量。資本家期望利潤率愈高愈好，而國家則想摸清楚資本家的真實利潤率，以便恰當地制訂加工訂貨的合理利潤。顯然，資本家不會輕易就範。從本質說，這是一場利益之爭。

「五反」運動以規範加工訂貨利潤為契機，借助於強大的政治動員和群眾運動，特別是爭取私營企業中的高級職員站到政府一邊，使得民族資本家的盈利狀況大白於天下。在加工訂貨的初始階段，本來是會哭的孩子有飯吃，「五反」運動恰恰是要脫掉鬧事的孩子的褲子，把他的皮囊看個究竟。如此，政府徹底知道了私營企業的真实狀況，為私人資本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或者說，經過「五反」運動，國家徹底清楚了私人資本家的家底，在新一輪的博弈中佔據了先機^⑨。而對資本家來說，「五反」運動則徹底把他們經營的手段和策略暴露在國人面前。此後，私人資本家要想吃飯，就得多給政府和工人做貢獻，即貢獻利潤，把資本利潤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給國家和工人，而只給自己留下很小的一份^⑩。在這輪分配博弈中，由於政府掌握了加工訂貨的合理利潤界定權以及私人資本家的內部人造反，他們手中已沒有甚麼牌可以打了。如果說加工訂貨只是把私人資本家綁在國家戰車上，那麼資本利潤計劃化，則是政府的殺手鐮，直接打在私人資本家的「七寸」上。私人資本家要麼與國家合作，接受改造，納入計劃經濟體系，要麼慘遭淘汰。

經過「五反」運動，國家徹底清楚了私人資本家的家底，而對資本家來說，「五反」運動則徹底把他們經營的手段和策略暴露在國人面前。此後，私人資本家要想吃飯，就得把資本利潤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給國家和工人，而只給自己留下很小的一份。

二 倫理生活政治化

如果說利潤計劃化是「五反」運動創造的削弱資產階級的殺手鐮，從外在方面給民族資產階級套上了金剛圈，那麼商業倫理政治化就是從內在方面控制民族資產階級的緊箍咒。前者用經濟手腕把資產階級綁在國家戰車上，限制民間市場，使資產階級喪失反抗的能力；而後者則用精神力量，誅殺資產階級的價值系統，使之喪失反抗的欲望。兩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最終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準備了條件。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倫理世界的政治化：第一，人倫秩序政治化，這是政治運動的共同特點。從根本上說，政治運動的目的就是要破壞生活世界的人倫秩序，使民眾認同共產主義道德^⑪。第二，商業倫理政治化，這是「五反」運動政治化倫理世界的特殊性。具體說來，這一層面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即對資本家唯利是圖商業倫理的批判，以及顛倒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價值觀念。第三，與第二個層面相關聯，在「五反」運動中徹底批判奢侈消費品的商業觀念。這既與批判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有關，也跟中共對城市的功能定位有關。因為第一個層面是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共性，而第三個層面只是作為第二個層面的補充，以下將重點分析第二個層面。

(一)「外公，你坦白了沒有？」：人倫秩序政治化

中國傳統社會是由人倫秩序框定的社會，每個人在特定的人倫關係中佔據相應位置。這種人倫秩序在運動倫理下幾乎土崩瓦解。運動倫理在人們心目中種植的是階級感情，「五反」運動亦如是。

譬如，上海中華鐵廠廠長童伯型的兩個女兒、一個女婿、一個弟弟都是共產黨員、團員和積極份子。為讓童坦白交代問題，他們在黨的領導下，連夜召開家庭會議，包圍他。即使在軍事幹校讀書的兩個兒子，也給他下勸降書。童的妻子也倒向子女一邊。就連九歲的外孫女也問：「外公，你坦白了沒有？」如此富有政治性的話語，借助孩童稚真的質問，最終摧毀了童的防線。他不僅徹底坦白，還檢舉了經理傅守璞^②。另據天津仁立公司朱繼聖的經歷，也可看到運動倫理對人倫秩序的顛覆。「五反」運動伊始，朱繼聖覺得自己自解放以來一向守法經營，起初也沒太當回事。不久，長子朱起鶴專程從北京回天津，力勸父親盡快向職工檢查交代公司問題，其他子女也紛紛景從。朱感覺到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傷害，感覺「養子教父，有失體統」，實在難以容忍，最終父子之間大鬧一場，不歡而散^③。

對資本家來說，政治運動的重壓讓他們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躲避。固然，站在組織立場上看，這些子女都沒有錯，他們所做的都是「幫助父親政治上進步」的正當行為。可是，這種運動倫理的結果，是掏空了傳統人倫秩序的道德資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傳統觀念，變成了一切都向組織坦白的運動倫理，傳統人倫秩序徹底政治化了。

(二)「糖衣炮彈」：奢侈消費品的命運

早在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要防止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其實，糖衣炮彈隱喻以奢侈消費為特徵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1950年4月，毛澤東在一份批示中指出，對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應該限制和排擠^④。在「三反」運動中，暴露了黨內一些意志薄弱的幹部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迅速貪污腐化。換言之，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黨內腐敗問題就能從根本上得以遏制。「五反」運動為打擊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提供了有利契機。1952年6月24日，陳雲在講話中提到，猖狂一時的投機貿易逐漸歸於消滅。特別是在青年職工和學生中，已逐漸形成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本能反感和厭惡，比如小學生不願被叫「小開」，婦女不願被叫「老闆娘」，過去很多家庭婦女尚虛榮、講享受，「『五反』運動後則改變了這種觀點，勤勞樸素的社會風氣逐步建立起來了」^⑤。據上海有關部門統計，一些專門銷售進口貨和高級消費品的行業和企業，由於不能適應社會風尚的深刻轉變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已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和淘汰^⑥。

此外，消滅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還有賴於城市功能轉型。如果把城市功能定位為消費城市，要想消除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就把轉變資產階級的消費城市為無產階級的生產城市確定為重要的任務^⑦。這就為徹底根除奢侈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

(三) 移風易俗：商業倫理政治化

市場是企業家展現職業才華的舞台，而市場本身又瞬息萬變，資本家稍有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傾家蕩產。在這樣高風險的舞台上表演，抓住商機對資產階級來說尤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投機與抓住商機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利潤計劃化用經濟手腕把資產階級綁在國家戰車上，限制民間市場，使資產階級喪失反抗的能力；商業倫理政治化則用精神力量，誅殺資產階級的價值系統，使之喪失反抗的欲望。兩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自建國以來，中共一直打擊商人的投機行為以及投機行業。但如何界定投機行為和行業非常困難^②。比如，金融業在當時就被界定為投機業。天津私營金融業本為中國北方金融事業的搖籃，由於「五反」運動所反對的「五毒」之一就是投機倒把，金融業首當其衝。1952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作出了「徹底改造合營銀行，堅決淘汰私營錢莊」的決定，而到下半年，天津市29家私營錢莊即全部歇業。「五反」運動剛結束，天津市人民銀行就據央行指示，決定於12月15日把18家合營銀行合併為一家公私合營銀行，經理由國家幹部擔任^③。同樣，經過「五反」運動，上海私人行莊信用動搖，業務急劇下跌，與1951年相比較，1952年6月全市行莊存款下跌32.1%，放貸下跌41.59%，利率下跌20到50%不等。在這種情況下，私人行莊成了燙手山芋，恨不得早點讓國家來兼併^④。

資產階級之所以冒着風險在市場上打拼，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獲得利潤。但在「五反」運動中，中共着重批判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經營動機。這種批判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和政治動機，而非基於經濟理由。也就是說，資產階級追逐私人利益是不正當的、罪惡的。1952年1月16日，黃敬在天津指出，「工商界裏存有嚴重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弱點，主要表現在勾引幹部，要我們幹部學壞，用行賄，用腐化的生活，勾他們往壞道上走，這是一種很壞的事情，是最傷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⑤。3月25日，陳毅在上海公開宣稱，唯利是圖是資產階級的「惡劣本質」^⑥。

7月2日，黃炎培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總會第二次總會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對於民主建國會工作的指示，其中關於唯利是圖的思想，毛澤東指出：「資本家唯利是圖，人家說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國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餘一部分是資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他們所圖的利，三方面都能夠順利，正是希望他們，需要他們來『圖』，只不能讓他們光是圖私人的利。」^⑦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在於，至少從表面上看，他批判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動機不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而是運用了完全政治化的修辭。其潛台詞是，資產階級不能唯自己的利是圖，而要為國家和工人階級謀利益。換言之，如果資產階級甘願成為國家和工人階級的公僕，圖利就是正當的了。其實，即使不借助於最高領導層的宣示，資產階級在強大的政治動員所形成的群眾劇場中，也難以堅持自己的經營理念，而會逐漸形成新的集體無意識，即追逐私利是可恥的，為國家和工人階級謀利益才光榮。

如果說對資產階級投機行為及唯利是圖的經營動機的批判尚存有道德規訓的痕迹，那麼「五反」運動伊始毛澤東即提出要給資產階級三年來對共產黨的「猖狂進攻」給以重大打擊，並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⑧，這就徹底變成政治整肅了。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沒有對在新秩序下應該如何經商保持清醒認識。資產階級自由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被視為對社會主義經濟「領導權」的爭奪，事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在潛意識裏就認為市場經濟是盲目的、混亂的。這樣，在社會主義的政治格局下，資產階級商業倫理就徹底政治化了。或者說，本來是發展市場經濟的經濟要求，最終被批判為向社會主義秩序的政治進攻。

早在1947年10月27日，毛澤東就提出：「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

表面上，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動機不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而是運用了完全政治化的修辭。其潛台詞是，資產階級不能唯自己的利是圖，而要為國家和工人階級謀利益。如果資產階級甘願成為國家和工人階級的公僕，圖利就是正當的了。

們，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在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⑤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早在建國之前就已經被確定為遲早要消滅的階級，剩下的只是選擇消滅的時機和手段、付出最小政治代價的問題。

正是「三反」、「五反」運動提供了最佳的時機：一方面，毛澤東對黨內腐化幹部怒其不爭，指導黨內層層加碼「打老虎」；另一方面，把腐化的原因遷怒於資產階級的腐蝕，指揮圍殲資產階級。在「五反」運動中，毛澤東曾激烈地指出，「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⑥1952年6月6日，在「五反」運動行將結束之時，毛澤東又重申：「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⑦

「五反」運動期間，商業倫理政治化也體現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上，即「五反」運動就是要搞清楚誰養活誰，誰在道德價值上更高尚，誰更卑微的問題。顯然，運動的結果是徹底顛倒了資產階級的商業倫理，讓人們覺得是工人階級養活了資產階級，勤勞樸實的工人比唯利是圖、投機倒把的資本家要高尚得多。薄一波在總結五反運動的時候指出，在「五反」運動之前，「廣大工人群眾對自己所處領導地位的概念還是抽象的」，經過「五反」運動，工人階級「真正處於領導地位，真正發揮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群眾的政治積極性和生產熱情」（黑體為筆者所加）^⑧。

在中共帶領下，工人階級為捍衛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將鬥爭矛頭指向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來說，這場鬥爭不只是利益之戰，而且帶有消滅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的神聖性。如此則「三反」、「五反」運動初期的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1952年2月25日，薄一波抵達上海指導「三反」、「五反」運動之前，上海的「五反」實際上已經開始，而且火力猛烈，發生資本家自殺事件48起，死了34人^⑨。可見「五反」運動所激發的造反熱情迅速膨脹。

當然，一些大廠的工人階級還是比較冷靜的，他們在勞資協商會議後，很快就投入生產，勞資關係緩和。但一些中小廠則情況嚴重，毆打老闆者有之，要老闆娘給工人燒飯者有之，工作時候出去看戲者有之，總之以往老闆對工人的態度，完全顛倒過來重新表演一番。譬如，上海福濤金筆廠的老闆從張家口匯回一筆五十萬的款項，會計竟然不給他，最後釀成他晚上砍死會計，砍傷兩名工人，然後切腹自殺的慘劇^⑩。天津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工人不讓資本家管事，不聽資本家的工作分配，有的隨便開支企業的錢去買東西，有的店員認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實質就是工人把廠店管起來，不讓資本家管^⑪。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的自我意識徹底瓦解。面對強大的國家力量以及被喚醒的工人階級，資本家已經沒有往日縱橫商場的氣派，並且否定了商業倫理的價值。此外，中共對待資本家實際上是批判從嚴，處理寬鬆，資本家自然感激涕零，隨時準備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新舊政權轉變的過程中，民族資產階級一直沒有找準自己的位置，處於一種集體「失範」狀態^⑫。「五反」運動更是把資產階級的

資產階級自由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被視為對社會主義經濟「領導權」的爭奪。中共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在潛意識裏就認為市場經濟是盲目的、混亂的。在社會主義的政治格局下，資產階級商業倫理就徹底政治化了。

階級意識與新社會的主體意識之間的價值衝突表面化，經過「五反」的洗禮，資本家排出「五毒」，反而有了新生的希望。由此，奠定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當性。

三 小結

「五反」運動直接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借助於資本利潤計劃化和商業倫理政治化，國家徹底粉碎了民族資本家反抗的能力和欲望。通過前者，國家實現了對經濟秩序的再造，即民族資本主義徹底納入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後者是倫理秩序的再造，規範了資本家唯利是圖、投機倒把的本性，國家開始把剝削階級改造為國家幹部或自食其力的工人。利潤計劃化和商業倫理政治化構成了「五反」運動運作的微觀機制，奠定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經濟和心理基礎。「五反」運動以後，「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不可能再照舊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已沒有別的選擇」^④。

「五反」運動中表現出的運作邏輯，既是政治動員的結果，也反映了觀念的力量。觀念能夠起到把人類行為正當化的作用。一旦人類選擇某種觀念作為行為正當化的理由，剩下的就是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手段來實現觀念的問題。建國初期，中共拘泥於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把資產階級視為罪惡的階級，認為應該扔入歷史的垃圾堆。可如果從常識世界出發，資產階級在市場上投資，把工人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過程中，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因此應獲得恰當利潤。無論處於社會發展的何種階段，任何階級、階層的存在都應該由常識世界來回答；任何理論的實踐效用，都應該回歸生活世界。當「五反」運動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市場蕭條的時候，就證明了生活世界拒絕特定倫理而帶來的惡果。

在新舊政權轉變的過程中，民族資產階級一直處於一種集體「失範」狀態。「五反」運動更是把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新社會的主體意識之間的價值衝突表面化，經過「五反」的洗禮，資本家排出「五毒」。由此，奠定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當性。

註釋

① 參見〈1949年中國經濟簡報〉，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7。

② 中共並非在實行加工訂貨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伊始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真正對這一問題有突破性認識，是李維漢在1953年5月就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給中央並毛澤東的報告中才有比較成熟的提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李維漢是把國家資本主義本身當成一種把資本主義工業改造為社會主義工業的傳導機制，沒有進一步分析國家資本主義本身賴以成立的微觀機制。參見李維漢：〈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給中央並主席的報告〉，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冊，頁93。

③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3），附表7。本文中所提到的貨幣是以當時流通的人民幣計算。中國人民銀行1955年3月1日起發行新人民幣代替舊人民幣。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

④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天津市檔案館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天津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附錄表7。

⑤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237。

- ⑥ 劉少奇：〈關於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68。
- ⑦⑧ 薄一波：〈為鞏固「三反」、「五反」運動的偉大勝利而鬥爭〉，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頁536；537。
- ⑨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00。
- ⑩ 陳雲：〈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頁527。
- ⑪⑫⑬⑭⑮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天津卷》，頁286-87；343-45；350；1061；765；270-71。
- ⑯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工商體制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713；900。
- ⑱⑲⑳㉑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上冊，頁147-48；213-14；145；165；126；153。
- ㉒ 譚震林在1952年5月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稱，由「三反五反」引起的新情況可概括為「工人失業、成品積壓、物價下跌、不敢負責」十六個字。參見毛澤東：〈中央關於五反定案補退工作等的指示〉，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441。
- ㉓ 陳永發：〈中共建國初期的工商稅收：以天津和上海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8期，頁181。
- ㉔ 按照李維漢分析，新生產的價值，首先分為「工人的工資、企業的利潤和國營企業的利潤三個部分，三分天下工人階級有其二；而後企業利潤又分為國家的稅收、資本家的股息和紅利、工人的獎金和福利、企業的公積金，四馬分肥，工人階級得其大半」。參見李維漢：〈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冊，頁97。
- ㉕ 張鳴：〈執政的道德困境與突圍之道——「三反五反」運動解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5年12月號，頁46-58。張鳴教授關注的是政治運動倫理在「三反」、「五反」中的表現，筆者則着重考察「五反」運動之於傳統商業倫理的破壞和顛覆作用，或者說「五反」中所呈現出的對於傳統倫理破壞的特殊性。
- ㉖ 〈中央批轉上海市委關於五反第一戰役經驗總結報告〉，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頁501。
- ㉗ 〈在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紀錄稿上的批語〉，載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292。
- ㉘⑳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下冊，頁881；1105。
- ㉙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131。
- ㉚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頁2。
- ㉛ 胡其柱：〈「五反」運動再研究〉，《二十一世紀》，2008年6月號，頁60-68。
- ㉜ 〈黃炎培傳達毛主席對於民主建國會方針的指示〉，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頁540。
- ㉝ 毛澤東：〈中央轉發北京市委關於三反鬥爭的報告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頁21。
- ㉞ 〈中央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577。
- ㉟⑳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66-67；170；183。
- ㉡ 毛澤東：〈現階段國內的主要矛盾〉，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231。
- ㉢ 何永紅：《「五反」運動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121。